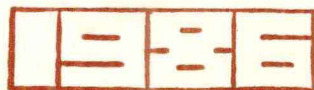


历史研究

第 5 辑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

书目文献出版社

辑

历史研究(5)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6)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剪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6 印张 154 千字
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统一书号: 11201·57 定价: 1.55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蓄意捏造、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目 次

古代史

- | | | |
|-------------------------------------|-----|----|
| 武士彠事迹另探 | 黄约瑟 | 一 |
| 《武士彠事迹另探》的几点商榷 | 张荣芳 | 二二 |
| 明末中日琉关系突变史一页
——琉球华裔政治家郑廻抗日殉国记(上) | 杨仲揆 | 二八 |

近代史

- | | | |
|------------------------|------|----|
| 赫德著《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三) | 邝兆江译 | 三二 |
| 长沙革命运动与武昌起义(上、下) | 刁抱石 | 四三 |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对德外交政策(下) | 张水木 | 五一 |

现代史

- | | | |
|-------------|-----|----|
| 段祺瑞与善后会议(中) | 沈云龙 | 七〇 |
|-------------|-----|----|

民族史志

- | | | |
|-------|-----|---|
| 蕃教与吐蕃 | 张骏逸 | 1 |
|-------|-----|---|

史学家

- | | | |
|---------------------|-----|----|
| 钱穆大师自学成名(五) | 程榕宁 | 七七 |
| 扩展中国历史研究的视野——访高明士教授 | 张中复 | 八一 |

武士護事蹟另探

黃約瑟

一、引言

本誌八二年三月與四月號連載宋德熹先生大作「唐武士護事蹟辨證」，考察武氏家世，及其對武則天立后事件的關係。作者研究武則天立后經過，指出武后家世卑微，因此後來特意粉飾出身；兩唐書武士護傳及文苑英華載武士護事蹟的攀龍臺碑，均源出偽造，動機在替武氏抬高身價，故此內容不能置信。文章分析各家學說，提出獨特見解，論說明快，值得細讀。拙文無意詳論武則天立后問題，只準備以部份不同史料，採取不同角度，甘冒狗尾續貂之嫌，去探討武士護這個人物。

二、冊府元龜的史料問題

一般有關武氏史料，多以兩唐書本傳為主。但兩書史料，並非原來面目。新書材料大部份早見舊書，而舊書卷末史臣註語，亦清楚指出武氏傳記曾經一番剪裁：「凡涉虛美，削而不書」，原因是唐初史臣許敬宗爲了討好武則天，很可能在傳內加入褒詞。史官爲了巴結政要，不惜歪曲史實的例子，古今中外，並不稀奇。許敬宗缺乏史德，唐人亦早有指摘。但要決定許敬宗或其他史官曾否無中生有的捏造了武士護事蹟，仍需要對現存史料作嚴密的考察。一個先得考慮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復原舊唐書編者或前述史臣曾經目睹過的史料？

唐代史料，並不全見於兩唐書。清人岑建功輯舊唐書逸文

，已經指出唐會要與冊府元龜二書中，有不少逸文，但由於未清楚註明來自唐書，故不加採錄。其實這些逸文不一定出自唐書，而實源於唐代實錄或其他史料。有關武士護事蹟，冊府元龜中便有一批兩唐書未載的資料。把三者重新組合起來，可以構成下面的一篇傳記（兩書用標點本，冊府元龜用臺灣中華書局八一年複印本）：

- ① 武士護，字信。（新書卷二〇六）
- ② 并州文水人也。（舊書卷五十八。冊府卷七七二頁九一八四作太原人）
- ③ 才器詳敏，少有大節。及長，深沉多大略。每讀書，見扶主立忠之事，未嘗不三復研尋，嘗以慷慨嘗名爲志。（冊府卷七七二）
- ④ 世殖貲。（新傳）
- ⑤ 家富於財，頗好交結。（舊傳）
- ⑥ 高祖初行軍於汾、晉，休止其家，因蒙顧接。（冊府卷七六六頁九一〇三至〇四。舊傳同）
- ⑦ 初爲晉陽宮留守府司鎧參軍，每歎息以夷難爲心，而恨未遇眞主。（冊府卷七六六）
- ⑧ 及高祖爲太原留守，甚見接待，數訪以時事。士護嘗詣朝於街內獨行，聞空中有人言曰：「唐公是天子。」士護尋聲不見人，乃以此言白高祖，並進兵書。高祖悅之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尚能將來，深識好心，當

同富貴耳。」其夜，士彥夢高祖乘馬上天，且以狀聞，高祖大悅，於是出入臥內，委以心腹。（冊府卷七六六，以卷二十一校勘改衍作街，加人、幸、出三字。）

⑨及義兵將起，高祖陰募勇敢士，遣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分統之。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謂士彥曰：「弘基等背徵三衛，所犯不輕，吾欲禁身推覈。」士彥曰：「此並唐公客也。若爾，便大紛紜。」威等由是疑留不發。（冊府卷三四五頁三〇九一至九二。背本作從，照舊傳改，餘略同）

⑩高祖先令士彥伏兵於宮城東門外，以防不虞。留守司兵田德平知之，方欲白威等。（冊府卷三四五）

⑪又欲勸威等鞫問募人之狀。（舊傳）

⑫士彥遂與德平論利害之機，曰：「當分討捕之兵，總隸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並寄坐耳，須發即起，彼何能爲？」德平遂止。（冊府卷三四五。舊傳略同）

⑬執王威、君雅等，士彥以功授正議大夫。（冊府卷三四五。議字本作護，據隋書卷二十八改）

⑭大將軍府司錄參軍，並賜物等。（冊府卷三四五。舊傳作大將軍府鎧曹）

⑮從平京城功，拜光祿大夫，封太原郡公。（舊傳。新傳作義原郡公）

⑯武德初，宴元勳人等於含章殿，賜酒作樂。散金銀錢頗羅等，任取多少。仍有詔與長孫順德等免恕一死，以彰元勳。（冊府卷三四五）

⑰初，義師將起，士彥不預知（新傳作不與謀），及平京

師，乃自說云：「嘗夢高祖入西京，升爲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黨也，以汝能諫止弘基等，微心可錄，故加酬効，今見事成，乃說迂誕而取媚也？」（舊傳。新傳略同）

⑱武德中，檢校并鉞將軍，多有獻納。勅令將家口入官。檢校右廂衛，仍知官，俄留守光祿給養。（冊府卷六二六頁七五二一）

⑲妻患危懼，竟不請假出看。先是在并鉞軍之日，有兩兒患重，以至於沒，亦不赴問，但傷悼而已。及妻死，所司奏刺曰：「此人忠節有餘，去年兒夭，今日婦亡，相去非遠，未嘗言及，遺身殉國，舉無與比。」（冊府卷六二七頁七五二九）

⑳既喪妻，高祖謂士彥曰：「朕自爲卿更擇嘉偶。隋日有納言曰遂寧公楊達，英才冠絕，突無親賢。今有女，志行賢明，可以輔德。」遂令桂楊公主與楊家作婚主，降勅給親，庶事官給。（冊府卷八五三頁一〇一四〇）

㉑武德中，累遷工部尚書。（舊傳。冊府卷四六四頁五五二二無累遷字）

㉒進封應國公。（舊傳）

㉓判六尚書，賜實封八百戶，士彥爲性廉儉，期於止足，殊恩雖被，固辭不受。前後三讓，方遂所陳。（冊府卷四六四）

㉔揚州有人告趙郡王孝恭有變，迫入京屬吏。高祖令士彥馳驛，簡校揚州都督府長史。（冊府卷六七頁八〇二四。都字前疑有大字，參第五節）

②移丹陽郡於都，不日而就，時論以爲明幹。（冊府卷六九〇頁八二三一。都字前疑有江字，參第五節）

③開關田疇，示以刑禮，數月之間，歌謠載路。（冊府卷六七頁八〇九二）

④又歷利州、荊州都督。（舊傳）

⑤（貞觀五年）十二月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護等詣朝堂，又上表請封禪。帝曰：「……比年穀稼頻登，疾疢不作，誠宜展禮名山，以謝天地，但以喪亂之後，民物凋殘，憚於勞費，所未遑也。」（冊府卷三十五頁三八五）

⑥貞觀中爲荊州都督，初居任時，有白狼嘉禾出於境內。至是太宗手勅曰：「公比潔多，方思春日，姦吏豪右，畏威懷惠，善政所暨，詳於屢臻，白狼見於郊野，嘉禾生於隴畝。」其感應如此。（冊府卷六八一頁八一三八）

⑦貞觀九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諡曰定。（舊傳）

從上面的整理可以看到，二書武傳不見於冊府元龜部份，有①、④、⑤、⑪、⑮、⑰、⑲、⑳等條。冊府元龜有載而二書不錄部份，有③、⑦、⑧、⑩、⑬、⑭、⑯、⑱、㉑、㉒、㉓、㉔、㉕等條。大致上冊府元龜資料略爲豐富，特別有關武氏後期出任地方官部份。

必須指出，舊唐書記載一般雖較新唐書詳盡，但亦非一成不變的轉錄原始史料，而也是經過剪裁而成，因此可能會失掉部份有價值的史料。武氏傳的完成，亦不一定如舊書史臣所說，只是削去原始史料的虛美部份那麼簡單。舊書中與武氏傳同

卷的馬三寶傳，十分簡略，新書馬傳比較詳細，但冊府卷一二七仍有一條二書未載史料，說明了即使新書有所補充，仍未必能盡補舊書所略。再看舊書武氏傳不錄而見於冊府元龜的資料：③、⑦和⑮條可算虛美之詞；⑦、⑧、⑩、⑬、⑭、⑯、⑱和㉑條可能曾經文飾，但亦兼載事實；而⑩、⑬、⑭、⑯、⑱和㉑條則只錄事實。不過我們不能因此便作出結論，認爲冊府元龜資料，便是兩唐書武氏傳藍本，或是史臣削去部份。事實上，㉑條便應該源於實錄體的記載。其餘部份，雖然可以相信源於傳記式材料，但⑧條至⑯條，一直肯定武氏在太原起兵一役的角色，而出自兩唐書的⑰條，却似乎否定武氏所爲。究竟孰真孰假，誰是誰非，下面將詳加討論。

三、太原起兵前的武士護

武士護以功臣身分獲「免死罪詔」一事，除了上節⑯條外，分見唐會要卷四十五、冊府元龜卷一三〇及舊唐書卷五十七劉文靜傳末。唐會要紀錄兼載得詔者官職，與劉傳末紀錄大致相同。武士護職作庫部郎中，但唐六典卷五等處均指出郎中是武德三年新改的官名。唐儉職作內史侍郎，但舊唐書傳載唐在武德元年除內史舍人，尋遷中書侍郎，而內史至武德三年亦改爲中書，故唐儉任內史侍郎可能也是武德三年。另外趙文恪的都水監據舊書本傳亦是武德二年事。由此看來，會要所載得詔者官職可能是後人所加。冊府元龜紀錄，可能是最原始史料。

免死罪詔文，以「……李高遷等，並恕一死」結束。考會要同卷貞觀十七年詔、總章十七年詔、神龍元年詔體例，「等」字用於名單上最後一人，但意思不指有其他人未列入。因此

免死詔所列十六個人，應該是全部功臣。但冊府卷三四五載楊屯初仕隋爲鷹揚郎將，遇高祖（李淵）討捕于太原，起兵時授爲統軍，屢立功勞，後來以「佐命元勳」，約免一死。大唐創業起居注中有楊屯（叢書集成本作毛），先後任大將軍府統軍或副統軍，及領軍往高屯道事，因此冊府元龜楊屯事蹟，應可相信。但楊屯名字不見於免死罪詔，可能是詔上名單不全，也可能領免死罪詔事不僅一次。不管如何，兩書武氏傳雖然未提到免一死事——除劉文靜外，本傳提到此事的只有劉弘基、唐儉和竇琮——並不成爲否定武氏是詔中一人的積極證據。問題應該是：他否立了甚麼功績，得以成爲太原元謀和佐命元勳的一份子？

單從免死罪詔上人物加上楊屯來看，李淵起兵太原的班底，大致來自三種不同背景。第一種是在太原當文官的：劉文靜、裴寂、劉世龍、殷開山、武士彠均屬此類。第二種是隨着李淵到太原或本在太原統軍的：趙文恪、張平高、許世緒、楊屯均屬此類。第三種是因逃亡、避仇或其他原因寄居太原的：長孫順德、劉宏基、竇琮、李思行、李高遷等可屬此類。再檢討詔上無名而曾參加起兵的：第一種有姜謩（冊府卷三四五作謨）、段偃師、權弘壽、劉瞻、柏季纂等；屬第二種的有田德平、姜寶誼等；此外李淵起兵時職任不詳的有王長諧、溫大雅、大有兄弟等。總而言之，李淵起兵，集結了太原地方上的各種勢力。

太原舊屬北齊，由於地理因素，素爲軍事重地，也成爲反中央勢力的據點。隋文帝楊堅去世後，五子楊諒便曾以太原爲基地，起兵對抗新登位的二兄楊廣。李淵起兵攻取長安後次年

，劉武周得到太原郡晉陽縣豪右接應，進軍太原（舊書「劉政會傳」），再次反映出太原的重要性及其附近的本地勢力不容忽視。冊府卷七指出李淵在任弘化留守時，已經「御衆寬簡，結納英豪」，可知他當時早已開始建立自己的勢力。他到太原後繼續集結本地勢力，可以說是一種當然的發展。

這一班在太原有勢力的人仕，有不少本來出身太原，免死罪詔中便有五個屬於此類。其中的劉世龍，不單是個鄉長，還是個富人（起居注卷一）。舊書本傳說他一方面受到李淵接待，另一方面又出入王威、高君雅家。王、高是李淵副將，而起居注指高是煬帝楊廣舊部，相信他們可能負有監視李淵的任務。劉世龍後來探得王、高準備對李淵採取不利行動，暗中通知李淵。從他可以探得消息一事來看，可以想像他與王、高交情不淺。劉世龍以一個鄉長，同時與派系不同的官長打交道並且建立親密關係，最大原因，是因爲他在地方上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太原是當時中國通往北疆的主要交通中心。楊諒曾在這裏立爐鑄錢的原因之一（隋書卷二十八），除了原料可就地取材外，很可能與當地貨物流通量大，貨幣需求量亦大有關。上節④⑤條和太平廣記卷一三七均指出武氏是個商人，經營木材生意，甚至有其他買賣。總而言之，說武士彠是個有財有勢的地方強豪，可能與事實相去不遠。

李淵若曾經與劉世龍和其他太原本地人仕接近，也非常可能曾與武士彠打交道。這種關係，當然不是單方面可以引致的。一方面李淵希望拉攏本地勢力，另一方面武士彠亦想討好李淵：⑧條載武士彠以各種手段，包括自己經歷過的幻象及夢境去討好李淵，用昔日的尺度去衡量，未必如今日看來之幼稚與

迷信。李淵和武士護關係，比較舊書「唐儉傳」中所見李、唐二人關係，實在有不少相似之處。武氏因為缺乏唐氏與李淵同領禁衛的舊日交情，不得不用各種方法去討好李淵，也是可以理解的。李淵鑒於武氏在太原的影響力，表面上作出一副委以心腹的態度，亦毫不為奇。⑩條載李淵指武士護是王威一黨，並不和李武二人關係良好的事實矛盾。李淵後來的指摘，其實只提供了武士護在太原時和劉世龍相似的地方：兩人均以和官府打交道為常事。

武、劉這種行為，當然是由他們本身的利益着眼。消極的說，這是一種保護措施，藉以減少中央派駐官欺壓地方長駐官的機會。積極的說，有了中央派駐官作後盾，地方長駐官本來擁有的影響力，便如虎添翼，無往而不利，營商者更能得到種種方便。不過我們懷疑，武士護和李淵打交道，除了希望鞏固和加強自己在地方的勢力外，還有希望在仕途上獲得發展的目的。

開皇十六年，隋文帝曾下詔工商不得仕進（隋書紀）。這與其說是一種先發制人的手段，毋寧說是一種亡羊補牢的措施更為妥貼。「商而優則仕」在當時似乎是一種頗為普遍的觀念。隋書卷七十五載西域人何胡邪移民中國後，不但自己發達，其子何妥更成為國子祭酒。但同樣成功的例子，後來很可能因為隋文帝的詔令而告減少甚至消失。舊書武氏傳同卷的「平陽公主傳」內提到胡賊何潘仁。據冊府卷三四五，他也是西域胡商的兒子，但成就不比何妥，官場失意外又兼犯法，於是以私人財富召集一班門下客起兵。「平陽公主傳」載他被馬三寶說服來歸，冊府元龜的紀錄則說馬三寶奉公主往謁，另外舊書卷

六十又有他與李淵從父弟李神通聯軍事，可知他和李淵陣營關係密切。不過他的部下如長史李綱在唐軍攻入長安後被調職（舊書卷六十二），軍隊因改組而實力受到削弱，而何潘仁本人亦在武德二年陣亡（冊府卷四二五），所以事蹟不為後人注意。但其實他也可算是另一個熱中仕途之商人參與李淵陣營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何潘仁以財力募軍，在當時並非個別現象。冊府卷九二〇載李大恩，「家富於財，見天下將亂，致豪傑以為腹心」，可為例證。我們沒有證據認為武士護擁有私兵，但他若果有此意圖，實在並不困難。「劉文靜傳」載「太原百姓避盜賊者，皆入此城……一朝嘯集，可得十萬人。」雖不免誇張，却正說明了當時武氏擁有私兵的客觀條件。李淵與劉世龍、武士護等打交道的的一個具體目的，可能是利用他們的財力和對地方上的認識，協助組織軍隊，甚至吸收他們可能擁有的私兵。事實上，舊唐書卷六「武則天本紀」載武士護在隋末任鷹揚府隊正。唐代隊正是個帶領五十人的小頭目，隋代大概亦不相上下。總而言之，武士護無疑熟悉軍隊中的各種事務。他能在太原作司鎧參軍，後來又在李淵的大將軍府作司錄參軍，實在並非偶然。

免死罪詔上沒有名字的田德平，據冊府元龜記載，也是出身太原。他的家庭背景雖然缺乏詳細記載，其經歷卻與武士護有相同之處：他在隋末補鷹揚府隊正，李淵上任後為司兵，起兵後任大將軍府兵曹參軍，創業起居注亦有他的紀錄。上節⑪⑫條指出他起初並不屬於李淵，而是由於武士護的遊說而來歸。表面上似乎武士護有先見之明，得為李淵陣營加添實力，

借此記載是否全部屬實，值得懷疑。武、田二人分任司鎧、司兵，官職相近，官位亦應相同（隋書卷二十八）。田德平後來得到銀青光祿大夫的散官位，大概是賞賜他改投之功；武士護亦以功授正議大夫。比較兩個散官位，前者從三品，後者則是正四品，是田氏比武氏獲賜稍高。由此可知，田氏放棄支持王、高陣營，除了武氏的勸說外，可能尚有本身的自發性或其他因素。武傳所載，有誇大武氏功勞之嫌。

王、高陣營失勢後，劉世龍也得過銀青光祿大夫的勳官。據昭陵碑錄，唐儉亦在獲拜大將軍府記室前後，加正議大夫一官。和武、田一樣，這二人均出身太原。值得注意的，是除了⑩條外，沒有其他確實紀錄指出他們四人曾積極參與囚捕王、高事件。起居注載有同樣出身太原的趙文恪在起兵時與長孫順德伏兵晉陽宮東門，但他却沒有得到勳官的紀錄。如果大膽假設，我們可以認為⑩條武氏伏兵事是偽造，而散官位則是頒給未曾參與事變的太原有勢力者，作為安撫人心的一種手段；亦即是說，武氏沒有立過大功。

不必否認，除了起初勸阻王、高對李淵募兵事採取行動外，武士護在太原起兵一役中角色並不明確。但亦應該指出，史籍實在並未詳細記載政變中各人角色。事件先後發生於癸亥夜的宮城東門和翌日甲子旦的官府內，但起居注只提到長孫順德和趙文恪二人，冊府卷七則只有長孫順德及劉弘基，舊書紀更是一人不提。可以想像，不少免死罪詔上有名及無名者，均曾在策畫或實際行動中，參與並支持其事。更應該指出，軍事行動只是以武力制止了王、高陣營的行動，眾人支持李淵，還得等待兩日後突厥來侵，大家以為係王、高引致才開始。製造這

種輿論的人，來自日後求助突厥的李淵陣營，而最適合的人選，自當是在本地最有影響力的太原原籍人仕。

應該承認，武士護之參與李淵陣營，實在有跡可尋。不管他曾否積極參與打倒王高的行動，又曾否遊說田德平袖手旁觀，甚至倒戈相向，但他既然知道李淵募兵事而又對王高的干涉加以阻止，他對李淵準備兵變事必早有所聞。因此⑦條前半他不預知的說法實在值得商榷。這種記錄歧誤的情形，令人懷疑史料可能來自不同出處，又或是舊書編者所加。不過新書編者也發現這個說法與前面所載互有出入，因此又改作不與謀。但即使武氏不曾直接參與兵變事，仍可以相信，他和一些居於太原和原籍太原的人仕，必立下間接功勞，得到評價，獲賜散官位，替日後得到免死詔事，種下前因。（附表一及表二）

表一：太原元勳表一（免死罪詔上有名者）

姓名	起兵前職	大將軍府職	武德元年職
劉文靜	晉陽令	司馬	納言（正三品）
裴寂	晉陽宮監／副監	長史	尚書右僕射（從二品）
長孫順德	（逃役）	統軍	左驍衛大將軍（正三品）
劉宏基	（逃役）	統軍？	右驍衛大將軍（正三品）
趙文恪	鷹揚府司馬	右三統軍	？都水監（正五品）
賈琮	（逃役）	統軍	右屯衛大將軍（正三品）
劉政會	鷹揚府司馬	戶曹參軍	衛尉少卿（從四品）
劉世龍	晉陽鄉長	？	？鴻臚卿（正三品）
殷開山	太谷／石艾縣長	府掾	吏部侍郎（正四品）
柴紹	太子千牛備身	右領軍長史	左翊衛大將軍（正三品）

唐 俊※	(不仕)	記室參軍	內史侍郎(正四品)
武士驥※	司鑑參軍	鎧曹(參軍)	庫部郎中(從五品)
張平高	鷹揚府校尉	軍頭左領軍將軍	驃騎將軍(正四品)
許世緒※	鷹揚府司馬	右一府司馬	左驍衛長史(從五品)
李思行	(避仇)	右三統軍	驃騎將軍(正四品)
李高遷	(客遊)	右三統軍	驃騎將軍(正四品)

註：(1)名字後有※者為太原本籍人。

- (2)起兵前職及下將軍府職依各人本傳(舊五七、五八)參以舊紀、大唐創業起居注、冊府元龜紀錄作成。
- (3)武德元年職，唐會要四五許及二李均作左驍衛長史，當以舊五七為準。

表二：太原元勳表二(免死罪詔上無名者)

姓名	起兵前職	大將軍府職勳	唐初職勳	出處
姜 肇	晉陽長	司功參軍	長道縣公	舊五九
溫大雅※	(不仕)	記室參軍	黃門侍郎	舊六一
溫大有※	(不仕)	記室參軍	中書侍郎	舊六一
段偃師	太原司法書佐	?	?	舊六八段志玄傳
段志玄	?	右領大都督府軍頭	驃騎將軍	舊六八
權弘壽	晉陽留守	?	?	舊一八五上權懷恩傳
劉 瞻	太原縣長	諮議參軍	浩州刺史	唐文拾遺一四
姜寶誼	鷹揚郎將	左統軍	右武衛大將軍	新八八
崔善為	樓煩郡司戶書佐	司戶參軍	?	新九一
唐 憲※	(不仕)	正議大夫	太子右虞侯	冊七六六
柏季纂?	祁縣長	騎曹參軍	上柱國	冊七六六
田德平※	鷹揚府正	兵曹參軍	魚陽縣公	冊七六六

張道源※	(不仕)	戶曹參軍	范陽郡公	舊一八七上
陳演壽?	?	左軍府長史	?	創，冊四一三
王長諧	鷹揚郎將	右一統軍	?	創，通鑑一八四
沈叔安	?	佐?	刑部尚書	創，元和姓纂七三四五、九
楊 屯	鷹揚郎將	統軍	將軍	冊三五(或作楊毛)

註：(1)名字後有※者為本籍太原人，有?者籍貫不詳。

- (2)舊唐書略作舊，新唐書作新，冊府元龜作冊，大唐創業起居注作創，數字為卷數。

(3)此表未盡舉可能是元勳者，所舉只限起兵前職及(或)大將軍府職勳有清楚紀錄者。

四、從太原到長安

李淵除掉王威高君雅後，一面與突厥取得默契，獲得馬匹軍隊，一面則派兵迅速攻下本地反對勢力據點的西河郡，然後建立了大將軍府，作為他的勢力組織。據資治通鑑記載，大將軍府的六個統軍，沒有一個出身太原。這份紀錄看似詳明，其實源於大唐創業起居注。不過創業起居注的記載亦不完全；作者溫大雅與其弟大有雖然一同參與建立將軍府事，起居注中却没有提及溫大有。要明白大將軍府結構，還得參考其他資料。

舊書趙文恪、李思行和李高遷三人本傳，明記三人在大將軍府中任統軍，李思行傳更明載其事在唐軍破宋老三一役以前，所以應該是大將軍府初建時事。除了這三人外，武士驥任職鎧曹，應是鎧曹參軍的簡稱，田德平任職兵曹參軍，而戶曹參軍、記室參軍等職，莫不由本籍太原者擔任。據創業起居注，李淵在進軍途中，大量頒授散官。在唐軍攻下不久的西河，李

淵「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三大夫等官……自外當土豪雋，以資除授各有差……嘗一日注授千許人官」。這些授官雖然多是一紙空文——「所司唯給告身而已」——但李淵急需本地勢力支持的事實，從中可見一斑。

然而李淵需要太原人仕支持，只是一時權宜之計。李淵既然深謀遠慮的策畫兵變，當然想過如何去進一步擴充自己的勢力。早在去除王高二人前，他曾派長子和三子前往河東，替日後起兵做部署工作。舊書卷五十九的任瓌相信是其中一個目標。李淵任山西討捕大使時期，已經和任氏有交情；赴任太原，又託任氏照顧長子，後來李淵兵至龍門，任瓌便起兵來迎，分析形勢。此外，和李淵有聯絡的，有在京起兵的李淵從父弟李神通，寶琮的哥哥、聚眾千餘人於長春宮的寶軌（舊書卷六十），聚萬餘人於藍田的李淵婿段綸（通鑑卷一八四）。任瓌曾獻計李淵攻佔永豐倉，但李淵李身早有同樣計畫：冊府卷七載他佔得永豐倉後對下屬說：「吾千里遠來，志在此耳。」正是他完成計畫的一個寫照。隋代楊諒起兵時早有人指出：關隴是兵家必爭地，但楊諒沒有依計行事。李淵出身關隴，熟悉這個地區。太原雖然在他的起兵基地，但長安無疑是他首要目標。

如果說李淵到太原後拉攏本地勢力，他攻下長安後亦同樣接近當地名門望族。李淵進入京城後，起碼兩次重組下屬。第一次在置相府時，不過可見資料不多。第二次則是創立唐朝政權，建元武德之後。唐初重要官職，多授給隋朝舊官和李淵親戚。太原元從中，只有裴寂、劉文靜和殷開山繼續受重用。李淵攻入長安論功行賞的時候，並未完全忽略太原舊人。冊府卷七載：「其登京城，第一勳授光祿大夫、開國郡公，物一千段

。」對照②條，可知武士護屬於第一勳。不過武士護出身富商，散官或賞賜，並不能令他滿足。他希望的，還是一嘗大官滋味。

非常可惜，我們沒有這段時期武氏當官的確實資料。但上節引唐會要卷四十五載武氏為庫部郎中，郎中一名雖始設於武德三年，但官職一向存在，而且性質與銓曹參軍相近。我們可以猜測，武氏在唐初可能曾任此職。舊書「職官志」謂李淵發迹太原後，「官名稱號，皆依隋舊」。據隋書卷二十八，庫部郎中在煬帝初稱為庫部侍郎。尚書省三十六侍郎中，官位表只載吏部侍郎為正四品，相信庫部侍郎官品亦一樣。楊廣登位後，新增侍郎一職，官位正四品，而三十六侍郎則改名為郎。考隋書百官志例，官職品位因改革的昇降皆有明記，而此處却未見舊侍郎減品。但新置侍郎官職既高於舊侍郎而又居正四品，則舊侍郎的官位必定下降無疑。唐代庫部郎中官位從五品上，可能溯源於楊廣時代的改革。武氏的庫部郎中，大概亦是一個從五品上下的官職。

了解到武氏棄商從政的動機，再體察他在武德初年情形，便不難明白②條的意思。眼見自己的上司並沒有替新政權立下絲毫功勞——屈突通是長安陷唐後的隋朝降將、趙慈景則在長安歸唐時被捕繫獄——武氏心裏難免憤懣不平。比較其他太原元從，他的官位亦顯然有所不及。與其說他向李淵邀功求官，不如說他希望獲得更高官職較為正確。

李淵的回答，亦值得細考。正如上節所述，李淵指出武氏屬王威一黨，只證實了武氏和官府打交道是常事。李淵明知武氏與自己的敵手互有來往而仍然在大將軍府內給予武氏一席位

置，足證武氏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和功勞。至於所謂「諫止弘基」，自是指王威等因武氏遊說而不追究募兵一事。李淵雖然口頭上說武氏只有「微心」，事實上却承認了武氏昔日在太原的影響力。李淵得以先發制人，武氏功不可沒。但到達長安後，武氏的利用價值大為降低，李淵的不耐煩態度，亦是可以理解。

唐會要及新紀均載免罪詔頒於武德元年八月，武氏抱怨官職不高與頒詔有否關係，因前者日期不確，無法肯定。但武氏似乎已經察覺到，單以本身的背景及功績，不足以使自己在仕途上有進一步的發展。唐軍雖然佔有長安，但中國多數地區仍處於兵荒馬亂局面。要揚名立身，最佳方法莫過於參軍建功，這也可能是②條武氏當上檢校井鉞將軍的一個原因。井鉞將軍大概是井鉞軍的將領之意；而井鉞軍成立日期，通典卷二十八作二年七月，唐會要卷七十二則作三年七月。另冊府卷四四七載姜寶誼為井鉞將軍時，奉令進攻往來雀鼠谷的劉武周將黃子英（新書卷八十八削井鉞將軍字），卷三四五又載他後來和裴寂戰宋金剛于汾州，遭敵擒殺。雀鼠谷在汾州介休縣，而介休在武德初稱介州（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二）。劉武周在武德二年四月敗李元吉于渝次，六月攻陷介州，同月裴寂進討劉氏。可知姜寶誼討黃子英事約在四月至八九月戰死之間（新紀），再參考前述通典紀錄，可能是在七月以後事。姜氏死時是右武衛大將軍，武士彠任檢校井鉞將軍任期，當在姜氏戰死前後。

除了姜寶誼，劉弘基後來也擔任過井鉞將軍。從二人事蹟來看，任該職需要親赴前線。但據新書卷五十，井鉞將軍實在關中十二道將領之一，職務一面是督促府兵耕戰，以供前線

需要，一面則是負起宿衛京城和宮廷的責任。大唐六典卷二十四載開元年間左右衛領宮廷警衛制度，提及東西廂及內廂，皆以大將軍或將軍守護，②條的檢校右廂衛，相信是唐代警衛制度的雛形，或隋制左右衛掌宮掖禁禦的延續。

但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武氏的「多有獻納」。貞觀三年，李世民指出「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通鑑卷一九三；參舊書卷五十七，文字疑有修飾）。當時貪污舞弊盛行的情形，不難從李密（舊卷五十二）、長孫順德的經歷中，略見一斑。隋朝末年東都乏食，商賈獻上象牙使得散官二品（通鑑卷一八五）。李世民當政後，顏師古引進富商大賈，結果被視作納賄而遭貶（舊書卷七十三），可知商人用錢買官，頗為普遍。李淵攻下長安後，罷外官給祿的措施，至貞觀八年仍未改變的主要原因，是當時財政拮据。武德初期，唐政權一面既要支援各路軍隊，一面又得大量賞賜支持者，結果不得不從劍南運米以實京師（冊府卷四九八）。政府對任何增添收入的方法，無疑大為歡迎。武士彠雖然已經由商人轉化為官僚，但在政治未上軌道時，使用其過去從商的一貫技倆，去達到自己的目的，是毫不為奇的。「多有獻納」，可以說是他的一種政治投資，最起碼的收穫，便是「將家口入官」。

武德期間戰事持續，中央政府官員亦調動頻繁。武士彠在短期內先後擔任庫部郎中、井鉞將軍，後來又任職光祿寺，乃至其他職位。總之，②條謂他「累遷」一事，當非誇張。問題是：甚麼因素使他可以登上工部尚書的位置？

③條「留守光祿給養」，相信是指任職光祿寺，負責食料及其他物資的供給分配。光祿寺的職務，名義上雖以祭祀為主

，但同時亦掌管朝會宴享的工作。李淵為避免楊廣猜忌，一度「縱酒沈湎」，所以如此，大概與他平日嗜酒好食也不無關係。從冊府卷一〇九的紀錄可以看到，李淵在天下未定時，宴享的次數已經不少。武氏任職光祿寺，大概不是卿（從三品）便是少卿（從四品），比起庫部郎中，自是一種昇進。但更重要的是，是他得到一個從口腹之欲方面去討好李淵的機會。

然而武氏又是否如①條所載，勤於任事達不到關心妻死兒亡的地步？武氏要「請假出看」妻子，又要「赴問」始能探訪兒子，則武氏妻兒似乎仍居太原。若果如是，太原從武德二年二月至三年四月，一直由劉武周所據，武氏兄長士逸即於此時陷敵。武氏可能此時有家歸不得。總而言之，「遺身殉國」，是值得商榷的誇張之詞。

如果說李淵初得長安後需要安撫關隴勢力以鞏固自己地位，唐室政權安定後，這種需要亦逐漸減低。武德二年末工部尚書獨孤懷恩起兵反唐（舊書五十八唐儉傳，卷一八三獨孤傳），更可能使李淵對過於倚重隋代關隴舊臣產生戒心。唐初因為屬於過渡時期，負責行政的尚書省不得不依靠昔日隋臣，但情形很快開始轉變。為了鞏固政權，李淵把部份官職分給先後跟隨楊廣往江南而後來投歸宇文化及政權的隋室舊臣，二年任吏部尚書的鄭善果，四年接任的封德彝，均是此類。而李淵的親信及部份太原元從，亦愈來愈受到重視。武德二年李淵婿竇詵任刑部尚書，後來由劉政會接任。同年殷開山為吏部尚書。三年唐儉任禮部尚書，皆是明證。武德二年獨孤懷恩任工部尚書，三年二月伏誅。從唐儉為工部尚書并州道安撫大使（冊府卷六五八）及獲贈獨孤懷恩田宅貨物（舊傳）二事來看，唐儉顯

然繼獨孤氏為工部尚書。但唐氏使還後任禮部尚書，故②條武士護任工部尚書，當在武德三年或以後。

李淵起用武氏，無疑是一改武德初年態度，對武氏另眼相看。這個改變，除了可能因為武氏慷慨捐輸，擅於逢迎之外，亦未必與武氏本身才幹無關。在建國初期的艱難時期，唐室不但需要軍人以武力鎮壓，同時得倚賴具有行政專長的人把各種事務納上軌道。這實在是一個機會，讓武氏發揮成功商人共同擁有的高度組織統籌能力。庫部郎中的職位和光祿寺的工作，無疑讓武氏有表現自己的機會；工部尚書的工作，同樣需要高度的行政手腕始能應付。李淵之選擇他擔任這個職位，實非偶然。

李淵既然重用武士護，他替武氏安排婚事自毫不為奇。③條未載日期，當在武氏昇官之後。這段舊門新貴的婚姻，先學多有卓論。可以略加補充的，是唐會要卷八十三載貞觀十六年詔，其中描述社會風氣，謂「燕趙舊姓，多失衣冠之緒……問名惟在於竊貨，結婚必歸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媾，多納貨賄，有如販鬻……」這種現象，並非貞觀期才出現。隋書卷七十載博陵趙元淑為驃騎將軍，無以自給，後娶會仕周為三原令的長安富人宗連女為妻，遂成鉅富，可算一例。唐室在武德五年始平山東，武氏即欲以燕趙舊姓為續弦對象，自非易事。楊達一家，縱未失衣冠之緒，但武楊結合中，若有「多納貨賄」成份，亦非不可能的。

武氏在工部尚書期內政績，不明見於史籍。唐會要卷三十載武德五年七月營宏義宮，或許由他籌畫。但我們可以相信，武氏不可能只靠財力而達到判六尚書的位置。從下節討論可知

，武氏在尚書省任職至武德八或九年。在武德期和武氏一樣任職五、六年者並不多見。唐儉比武氏早任工部尚書，昭陵碑錄載他食邑三千戶，實封六百戶（舊傳此處記載次序值得商榷，當以碑文為準），較武氏爲少，大概是由於他是黃門侍郎（唐氏由禮部尚書調職，疑爲降級），但柴紹得實封一千二百戶，又較武氏爲多。②條武氏實封八百戶的紀錄，可信度應頗高。③條封應國公事，亦不爲武氏專有。免死罪詔上沒有封國公紀錄的功臣，只有早卒的趙文恪，和武德後期事跡不詳的許世緒、李思行和李高遷。總而言之，到了武德末年，武士護已經實現夢想，成功的由大富演化成爲大貴了。

表三：武德時期三省初任長官表

官職	任官者	備註
尚書令	李世民	李淵次子
右僕射	裴寂	太原元從
納言	劉文靜	太原元從
內史令	賈威	李淵夫人從父兄，大丞相府司錄參軍。（舊六一）
內史令	蕭瑀	隋民部尚書，梁朝皇室之後。（舊六三）
吏部尚書	李綱	隋尚書右丞（舊六一）
吏部侍郎	殷開山	太原元從
禮部尚書	李綱	同上
禮部侍郎	韋義節	周朝尚書令韋孝寬孫，隋恒州史韋壽子。（元和姓纂二）
兵部尚書	屈突通	隋左驍衛大將軍（舊五九）
兵部侍郎	趙慈景	李淵婿（舊一八三）

民部尚書	賈璉	李淵夫人從兄子，隋扶風太守。（舊六一）
民部侍郎	？	
工部尚書	？	
工部侍郎	獨孤懷恩	李淵舅子，隋鄠縣令。（冊三〇一、四五〇）
刑部尚書	蕭造	隋刑部尚書（新紀，通鑑一八五）
刑部侍郎	李瑗	李淵從父兄子（舊六〇）
黃門侍郎	陳叔達	陳朝皇帝之後（舊六一）
黃門侍郎	崔民幹	隋隴泉縣令（冊七六六作幹略，疑誤；新七二下諱民字；另通鑑一八七作世幹）
內史侍郎	唐儉	李淵舊識，太原元從。

五、地方長官時期與死後名譽浮沉

據②條，武士護由中央大臣出調爲揚州都督府長史，是由於朝廷懷疑趙郡王李孝恭可能在揚州謀反。這是否事實？若然，事情本末又如何？

李孝恭是李淵從父兄子。武德七年三月，他率領大軍擊敗了江南以輔公祐爲首的反唐勢力後，出任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舊書本傳載他這段時期，「欲以威名鎮遠，築宅於石頭，陳廬徵以自衛」。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五，石頭城位居險要，三國時代吳國曾大肆修築以貯財寶金器，並置戍衛。李孝恭在這樣一個地方築宅，難免受人猜疑。這個地區在李孝恭治下，出現了一些行政改革。據舊書「地理志」，武德七年先置行臺尚書省，改揚州爲蔣州、廢茅州，又以句容延陵二縣來屬。八年，又立揚州大都督府，省金壇入近陵縣，省安業縣入歸化縣，又改歸化縣爲金陵縣，再加上丹陽、溧水、溧陽三縣。簡

言之，揚州成爲一個轄領六縣的大都督府。這些改革，可能是有人認爲他在擴張自己勢力的一個原因。

李孝恭受到懷疑，結果內調京師。舊傳說他後來「徵拜宗正卿」，新傳更清楚記載他受告發，以證據不足，於是「赦爲宗正卿」。舊書同卷又載武德九年（通鑑作八年末），李淵從父弟李神符遷揚州大都督。隋朝滅陳後，曾以楊廣鎮守江都多年，力求減低南北差距。但從隋末兵亂情形來看，可見這個地區仍然潛伏一股對抗北方的勢力。唐室以宗室統理揚州，可以說是隋朝政策的延續。

可以相信，武士彠擔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亦在武德九年，亦即是說，擔任李神符的副手。二人奉命接管揚州，想必奉有中央指示，再次改組地方行政，意在分散潛在反對勢力。舊書卷六十七謂「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也可能需要安撫。據兩唐書地理志，武德九年，揚州大都督府的六個縣，三個改歸潤州，三個改歸宣州，都督府也遷往江都，不能不說是一次大規模的改組。李神符傳更清楚指出，這次改組還包括了一次大規模的移民。兩書本傳分別指出這次行動，「州人賴焉」，「揚人成之」，可知過程順利。⑤條的「時論以爲明幹」，相信亦非誇大。

李神符事蹟，除了兩唐書外，尚見於唐文續拾遺卷十四李氏碑銘。李氏能擔揚州職任，其實主要是因爲他的背景。他在隋朝未曾任官，在唐初先後鎮守岐州和稷州，後來任并州總管，防禦突厥。史籍上有他兩次勝仗記載，但他後來調作宗正卿，掌領宗室屬籍事務，可能正因他並非軍事長才。揚州大都督府的工作，相信不少是由大都督下的首要行政官，亦即是武士

彠擔任的長史負起。碑文說李神符「以善政入爲太府卿」，大概是種掩飾。冊府卷二九九說李氏「少威嚴，不爲郡下所肅」（新書本傳作不爲下所畏），可知李氏在揚州後來的行政不一定順利。

然而，⑥條所載武氏政績，既無他證可稽，亦不得不存疑。武氏出身商賈，明白生產的重要，鼓勵人民去開闢田疇，亦可以說得通。貞觀時代的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桑」（舊書卷五十九「李襲譽傳」），武德末年的江都民風，大概相差不了。以武氏的背景和經歷去應付這種民情，縱然可能有些言語上的隔膜，相信要得心應手亦非難事，但在短期內有重大改變，大概並不容易。

武士彠獲派揚州要職，明顯的反映出他受到唐室的信賴和君主的賞識。但是，爲甚麼武氏在貞觀期不再活躍於政治舞臺，而且似乎更失去了功臣的名銜？

要了解這個轉變，必須明白當時政治舞臺上的發展。武德九年六月，李淵次子李世民在長安發動政變，同年八月登基，十月大封功臣。據舊紀及卷五十七，功臣名單上載有四十三人。細考各人背景，所謂功臣，主要功勞其實不在太原兵變一役或以後在各地的征戰，而在玄武門政變一役。名單中上約有四分之一是李世民的嫡系人馬，其中將近半數曾在李世民指揮下分任文職或武職，這些可算李世民的親信。另一類則是李世民覺得值得拉攏或安撫的，如王君廓、羅藝、安氏兄弟均代表了一些強盛的地方勢力。李孝恭是唯一唐室宗親，但由於遭受謀反之嫌疑，大概對李淵舊政府頗爲不滿。蕭瑀和封德彝入選，相信是因爲他們分別代表了陳朝和北齊的潛在勢力。名單中亦

有幾個太原元從，其中裴寂是舊識，其餘數人均曾任李世民政部，與李世民多少有些交情。

換一個角度，從沒有獲封的人去檢討，也可以看出這個功臣詔的一些特色。據舊書「長孫無忌傳」，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三人均曾參與政變，但均不列於功臣表。但據鄭仁泰墓誌銘（『文物』七二年四月號），鄭曾得實封二百戶。由此可見，三人不載，或與封戶數少有關。再考武德期曾任三省長官者中，只有唐儉和屈突通列名。這個情形，實為政變的當然結果。史家多注意玄武門一役的兄弟相殘，而忽視李世民的最終目標是向父親奪權。武德期間的大臣，可說是親李淵一系，李世民在政變後冷落他們，自是意料中事。事實上，政變後兵部尚書任瓌（據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即因此左遷外官（舊書卷五十九）。禮刑二部尚書鄭善果出為岐州刺史事，舊書本傳雖作貞觀元年，但記載可能和吏部尚書楊恭仁一樣有誤，實際應發生在政變之後（嚴表）。李世民分封那些與李淵有淵源但却值得拉攏的人，其實也是一種安撫權宜之計；以大量財力物力支持李淵在太原起兵的裴寂，在貞觀三年便受到排斥，免官削邑；身為李淵婿的柴紹，在貞觀二年出任華州刺史；劉弘基在貞觀元年因涉及他人謀逆事件除名。其餘如唐儉在貞觀年間一度外調遂州都督，屈突通為洛州刺史，錢九隴亦出為眉州刺史。這一班李淵早期的班底，不論曾否為李世民封為功臣，均先後外調，相信是中央政府因政變而引起人事變更的結果。

李世民為了增強本身勢力，大肆封賞本身一系的臣下，自然不易令所有人信服。事實上，武德九年九月，李世民曾先封長孫無忌和房玄齡等五人為國公，食邑各三千戶。這個措施，

引起李神通為首一羣人的反對。他認為自己早年即加入唐軍，現在却讓房玄齡等文臣居先，並不合理。李世民的答覆，是一面指出李神通在戰場上屢戰屢敗，而房玄齡等雖無戰功，但運謀用策，不遜於漢代蕭何，另一面則主張公私分明（事見冊府卷一二八等）。李世民的答覆，表面上有其道理。但他登基之初，加封李神通為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的時候，詔書上謂李通「早樹勳績」（冊府卷二七七），分明是自相矛盾。李神通縱然功勞不多，也不比長孫無忌少。再看李靖，先後破王世充、蕭銑、輔公祏，力抗突厥，在十月的封賞中只得到四百戶，原因自是他沒有參與政變。李世民當然無法掩飾封功臣的真意，他同時把部份封郡王的宗室降為縣公，其實就是一種高壓手段，逼使宗室就範（貞觀政要卷三封建）。支持李神通的一些將軍，亦只好噤若寒蟬。

李神符是李神通的弟弟，哥哥不得志，弟弟大概也被視作李淵一系的成員。碑文載李神符在貞觀元年內調為將作大匠，可能是李世民防範他在江南培養反抗勢力的結果。武士彠之得志官場是由於李淵的器重，自被視為李淵一系。他的名字不見於武德九年功臣名單的理由，顯而易見。

和多數舊日三省同僚一樣，武氏在貞觀時期只擔任地方官。②條載武氏任利州都督，考舊紀貞觀元年十二月，利州都督李孝常以謀反伏誅（其事本末分見通鑑卷一九二及冊府卷九二二）。通鑑提及李謀以宿衛兵作亂，未知是否牽涉到利州。但武氏任利州之職，大概是補李孝常遺缺，又或是奉命收拾殘局，其事當在貞觀元年或二年。至於武氏在李世民登位後至任職利州之間的活動，則欠缺資料。

從②條可知，貞觀五年末，武氏仍是利州都督。唐文拾遺卷十四，錄原載文館詞林卷四五九李百藥所撰荊州都督劉瞻碑銘，中述劉氏在貞觀二年除檢校荊州都督，五年詔除持節都督荆、硤、岳、朗、澧、東松六州軍事、荊州刺史。但從「賁亮之道未申，夭壽之期俄畢」的字句，可知其任期短促，武氏調任荊州，當是接劉氏之任。

荊州在武德初期一度為梁朝宗室蕭銑所據，至四年為李孝恭所平。和揚州一樣，潛伏着反對北朝勢力。李世民手勅中的「姦吏豪右」（②條），可能指此。無獨有偶，武氏三次外調，均屬唐室政權根基未固的地方。武氏初任大都督長史，雖似由正三品貶降為從三品，其實只是暫時性質，不能算作真正降級。利州在貞觀初年是轄領六州的上州，都督官位當是正三品。荊州在唐初由大都督降為都督府，武氏後再降作下都督府，可知武氏任內是中都督府，而武氏官位應是正三品上。武氏官位雖然沒有下降，朝廷更可能認為他有安撫民心的手腕，但從他長期任職地方一事來看，武氏官運其實已經到了停滯不前的地步。

我們可以推測，武氏不會不瞭解自己所處的地位，也希望能够在中央政壇上再振雄風。當朝天子李世民和他一無淵源，無疑是他仕途上的一大障礙。朝廷每年從地方上京報告政務的朝集使當然不只一人，但②條中只提到武氏一人名字的原因，必然是因為他在諸朝集使中，最為熱烈贊成封禪。贊成封禪，亦即是認為君主已達統治者的最高境界，是臣下對君主頌德的一種表現，也可以說是臣下藉機討好君主的一種手段。但封禪典禮繁重，支出浩大，唐初財政困窘，所以李世民明智的否決

了封禪的建議，而武氏也失去一次邀功機會。

②條記載白狼嘉禾出現事，以突出武氏政績為出發點，指出武氏得到天地感應，君主表揚。這段史料可能曾經後人修飾。實際情形，相信是武氏向朝廷報告祥瑞出現，以表揚李世民的德政。這種行為，參以冊府卷二十四帝王部符瑞項，並不罕見。而武氏所為，其實亦是早年告訴李淵夢見李氏為天子一事的翻版，目的在討好攀附。唐會要卷二十八載貞觀二年，李世民明言他雖吩咐所司上奏祥瑞，但並不認為祥瑞與政績有直接關係。七年後他更吩咐毀壞時人當作佳兆的鵲巢。可以想像，武氏這一招，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李世民的手勅，相信亦是一種對地方官的循例回覆和嘉勉。

武士彠既然生前得不到李世民垂青，死後不蒙優遇自亦不足為奇。③條載武氏在貞觀九年卒於官，而同是太原元勳的劉政會，亦在同年卒於官。武氏死後獲贈禮部尚書，劉氏則獲贈民部尚書，朝廷對二人的待遇大致相同，並沒有虧待武氏。劉氏去世前任洪州都督，洪州領八州，當是上都督府，較武氏所領荊州稍高。但這似乎不足以解釋何以貞觀十四年劉氏配饗李淵廟庭，而武氏却被摒棄在外。同時配饗者，尚有李神通、李孝恭和殷開山（唐會要卷十八，舊唐書卷五十八，舊紀無李神通）等人。武氏被遺落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他和李世民關係，不及殷劉二人密切（二李屬宗室，地位不同）。殷氏曾任李世民軍中長史，而太原兵變一役，是由李世民派劉政會去告發王高二二人而起。武氏雖在生前力圖有所表現，但未能成功，死後不得配饗，亦是順理成章的。

武氏在唐代建國初期的功績既然在貞觀十四年不受重視，